

稽古振今 传扬文化

——关于推动新时代古籍整理与研究工作的几点思考*

王 燮^{1,2} 孙 晓^{2,3}

(1.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继续教育与远程教育学院, 北京 100029;

2.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国学研究与交流中心, 北京 100102;

3. 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 北京 100102)

摘要: [目的/意义] 古籍是连接历史与现实的桥梁。古籍整理是赓续国家文脉的工作, 最能凸显中国传统学问的特色。在新的历史时期, 《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的印发, 对如何推进古籍整理工作意义重大。 [方法/过程] 结合自己多年的工作体验, 对古籍的内涵与价值、学问的特色与趋向等诸多方面, 进行探讨分析。 [结果/结论] 认为新时代古籍整理应该有自己的理论思考与方法创新。

关键词: 古籍 文化安全 汉籍之路 史家注史 古籍数字化

分类号: G256

DOI: 10.31193/SSAP.J.ISSN.2096-6695.2022.04.11

0 引言

2022年4月,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 要求相关部门认真贯彻, 落实执行。这是继1981年《中共中央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文件颁发后, 又一次针对古籍整理工作专门下发的重要文件, 对进一步推进我国当代古籍整理工作意义重大。

中华历史绵长悠久, 文化博大精深, 古籍文献缥緲满目、卷帙浩繁, 是我们文化自信的基础。2022年4月,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强调, 要“深入挖掘古籍蕴含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价值理念、道德规范, 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1]。总书记

* 本文系“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资助项目“出土文献与《汉书》的整理与研究”(项目编号: G3621)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王燮, 女, 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文化史, Email: wx_89@126.com; 孙晓, 男, 研究员, 博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史, Email: sx200863@163.com。

的讲话进一步明确了新时代古籍文献工作的发展方向。经年以来，我们躬体力行，致力传统文献的整理，与同仁一起，共同担纲国家重大文化项目《今注本二十四史》《域外汉籍珍本文库》编纂工作。兹据我们在古籍文献整理工作中的体验，谈一些认知与感悟。

1 古籍整理是最具中国特色的学问

古籍整理专指对古代文本进行删编、校勘、注释、标点、修复、描润等系统规范的加工工作，力求所整理的文本便于当代读者。《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2]开宗明义指出：“做好古籍工作，把祖国宝贵的文化遗产保护好、传承好、发展好，对赓续中华文脉、弘扬民族精神、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具有重要意义。”古籍文献是连接历史与现实的桥梁，古籍整理是熔古铸今、继往开来的工作。

人类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很多文明古国。中华文明绵绵不绝，或是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个中的原因，颇值得深究。在世界文明古国之中，中国是一个很早就注重用文字记述自己文明的国家。与古印度、古希腊、古波斯等文明相较，中国似乎缺乏可以传唱的史诗，但中国人更愿意以文本书写的方式传扬自己的文明。在中国毛笔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五、六千年以前。陕西临潼姜寨村一座新石器时代的墓葬，发掘出土的物品中便有石砚、石杵等与书写相关的文具，从彩陶的纹饰花纹，可以清楚辨认出毛笔的痕迹；在中国纸的出现最早可以追溯到西汉。中国国家博物馆里收藏着一张世界上最早的纸，1957年出土于陕西省灞桥，是西汉武帝时制造的，距今已逾两千年，在中国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可追溯到北宋。在中国四大发明中，与文本记述和传播有关的发明就占了两项，这无疑使中国的文本比世界其他文明的文本更早被大量复制，更方便流布传播。

中华文明重视文字记述，自然更重视记述文本的整理。旧的文本就是古籍，古籍整理是中国传统学术的基础，最能彰显传统学问的特点。自孔子始，对旧文献的整理、缀辑就是中国传统学术传承与发展的主要形式。这一特征与西方迥然不同，现在我们所看到的古代希腊、罗马林林总总的学人巨著，其实多从阿拉伯语转译而成。在西方学术发展历史上，很多古典名著因被译成阿拉伯语才得以传承，或许也可以把这些典籍视为伊斯兰文化的遗存。重译献典，肯定会留下整理翻译者的主观烙印，会有增删、讹误等一些问题，但是，对这一触及基础文本的重要问题，西方的学术几乎没有给予过多的研究和重视，时至今日，国际学术界常常会有西方古典文明的文献基础不太牢靠的疑问。

与西方不同，古籍整理一直是中国学术发展的主体形态。孔子是最著名的历史文化人物，被后人尊为“大成至圣先师”，所谓大成，就是集大成，把古人传下来的典籍，通过系统整理，传给后代，“孔子之谓集大成”。^[3]《论语》记述孔子说：“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4]由此可以看出，文献整理是孔子一生的日常工作，从卫国回到鲁国，他就努力把乐及与乐有关的《诗经》的《雅》《颂》乐诗整理齐备。孔子一生，颠沛流离，但他矢志不渝的志向是传承前代文化。“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5]他“述而不作，信而好古”^[6]，并以“韦编三绝”之精神，勤勉于古代文献的整理。中国传统经典如《易》《诗》《书》《礼》《春秋》等等，虽然不是孔子撰写的，但都是通过孔

子整理编纂, 才得以传扬。

我们可以从三个层面来理解为什么古籍整理最能凸显中国传统学问的特色。

首先, 古籍是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 是连接古今的桥梁, 是不可再生的重要文化遗存。为了让流淌在古籍中的优秀传统文化得到更好的传扬, 就必须做好古籍整理工作。从这个角度而言, 古籍整理不是简单的学术研究, 而是存亡继绝的工作, 是嗣续与传承中华文化的千秋事业。

其次, 古籍的分类、属性、门派不同。若按古籍学科门类, 传统有六分、四分、七分、五分等多种分类方法。传承至今的经史子集的四部分类法, 基本被普遍接受。我们编纂的《域外汉籍珍本文库》就是遵循古籍四部分类法进行分类的。这些年, 我们到域外访书, 发现国外图书馆汉文古籍大多也遵照四部分类法分类。若按古籍内容属性, 可以分为义理之学、考据之学及辞章之学; 若按古籍作者的学术归旨, 又可分为大学小学、汉学宋学、中学西学等等。大学小学也可以改称为汉学、宋学, 是中国经学发展史上的两大流派, 它们对经学各自有自己的解释。汉学尊奉五经, 宋学偏爱四书; 汉学崇尚训诂, 宋学重视义理; 中学西学的说法, 源于近代西学东渐, 是对明朝后期至近代西方学术向中国传播历史过程的描述。

复次, 治学方法截然不同, 如训诂、注疏、辑佚、会要等等, 并把这种方法视为治学的基本手段。比如训诂, 作为古籍字词音义的研读, 是一门讲究实用的综合性学问。解读古籍要从一字一词开始, 最终是要理解文本的本义。东晋训诂学家郭璞, 博学多才, 好古文奇字, 注释《尔雅》《穆天子传》《山海经》《楚辞》等, 为后世注疏家所推重。又比如辑佚学, 这是一门几近失传的绝学。辑佚是对其它文本以引用形式保存的失传文献进行收罗, 分类成卷, 努力使佚失的古籍得以复原。通过辑佚得到的文献, 称《辑佚本》。清代有很多学者在辑佚领域有辉煌的成就, 如严可均、马国翰、顾观光、姚振宗等等。当代印行的二十四史的《旧五代史》, 就是清代编纂《四库全书》时邵晋涵等馆臣的辑佚作品。我们编纂的《今注本二十四史·旧五代史》则是当代学人陈智超等人重新做的辑佚本。^[7]

2 古籍文本中蕴含着中国传统优秀的价值观念

1981年, 中共中央下发的《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8]指出: “整理古籍, 把祖国宝贵的文化遗产继承下来, 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关系到子孙后代的工作。”为什么说古籍是国家的宝贵文化遗存, 是因为古籍承载了中华民族的记忆, 蕴含着传统优秀的价值观念; 是因为这种文化价值观念已经被陶铸成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 并通过古籍的流传, 东鸣西应, 开枝散叶。

中华文明勃兴于东方, 源远流长, 辉煌灿烂, 而个性独特鲜明。自古以来, 中国文化就十分重视日常生活中的风俗与道德, 非常尊重习惯与传统。《尚书》是中国第一部历史文献典籍, 其中《洪范》一篇, 记述了周武王安定天下后, 曾向商代遗臣箕子询问如何治理天下。他们谈话时, 用了“彝伦”一词, 意思是平常的道理。箕子说: “天乃锡禹洪范九畴, 彝伦攸叙。”^[9]恰是对日常社会伦理的重视, 中国传统社会秩序的建设一直以“仁、义、礼、智、信”为核心, 《三字经》说“曰仁义, 礼智信, 此五常, 不容紊”, 五常是个人应该具备的五种基本的品格。孔曰成仁, 孟曰取义^[10], 到董仲舒时, 扩大成仁、义、礼、智、信”, 称作“五常”。这五常”如红线穿珠, 自

始至终贯穿于中华社会道德的演进过程之中，是特色鲜明的中华价值体系的核心元素。

古籍记述了中华文化的价值观，这些观念是民族文化的共识，是凝聚民族精神的载体。同时我们还应该看到，中华文化的价值观同样陶铸了东亚的文化共识。东亚文化是汉字文化，古籍是文化传播的基本载体。以《论语》在朝鲜半岛与日本流传的历史为例，可以更真切地理解古籍在促进文化共识过程中的作用。秦汉以降，自汉武帝“罢黜百家，表彰六经”后，《论语》被尊为“五经之鎡鍉，六艺之喉衿”。1992年平壤古墓出土《论语》残简，是西汉在朝鲜半岛北部设立四郡时期乐浪郡官吏的随葬品遗存。公元前18年，朝鲜半岛南部的百济建国后，即用汉字记事。据日本第一部汉字古籍《古事记》记载，应神天皇时（270~310年），百济博士王仁带《论语》十卷赴日。《论语》的注本《论语义疏》手写本近年在日本被发现，据日本庆应义塾大学等机构的研究，该写本出自约公元6~7世纪初的中国，传到日本后，被寺庙、旧书店收藏，应该是传世《论语》最古老的手写本；从文字形态等方面判断，该写本可能成书于南北朝末期至隋朝。^[11]今天，我们常常用儒家文化圈去描述东亚文化，展示其共性，其实，这一文化共性的铸造，源于历史上儒家典籍在这一区域的传播。

这次颁发的《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对古籍工作的意义的阐发，着眼点更高，看得也就更远。《意见》指出“坚持守正创新，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服务当代、面向未来，进一步激发古籍事业发展活力”。古籍工作绝不是学者们在故纸堆里描鸾刺凤，自娱自乐，而是传承与弘扬中华文化价值观的伟业。

3 古籍整理关系到国家的文化安全

其实，古籍整理不是单纯的文化工作，有时还会涉及国家文化安全问题。如果我们投身于古籍整理与研究，对这个问题会有很多真切的感受。古籍承载了古代文化的记忆，忘掉这些记忆，或有意地涂抹掉某些记忆，便会涉及到国家文化安全的问题。

宏观一点讲，古籍是中华文化的结晶，积淀着民族深层的精神追求。毫无疑问，古籍整理就是赓续国家文脉的工作，它不但可以向世界展示特色鲜明、斑斓多彩的中华文化，更重要的是还可以帮助今天人们把握住民族发展的脉动，更好地保护有中国特色的学术与价值观念。

就具体问题而言，古籍的记述内容宏富，很多会牵涉到国家的疆域的分界与领土的归属。在《域外汉籍珍本文库》编纂时，我们发现有些保存于国外、国内所不见的汉籍，因涉及到一些现实敏感问题，常常被编削或封藏。例如琉球王国最珍贵的历史文档《历代宝案》，是琉球国政府的外交档案，后来被琉球学人编辑成书。本书与原始文档均以汉字撰写，日本明治时，此书被日本人掠夺，正本存放于日本东京的内务省，传世的只有极少的民间手抄本。我们现在已经不可能看到原本，能看到的是日本人传出的本子。以日本人的本子比照我国台湾所收藏的早期抄本，便发现有很多差异。古代中国与琉球是典型的宗藩关系，在日本传本中，这种关系已被有意无意模糊。

历史上，越南民间信仰中有白马大王的神话。白马大王是越南著名的神祇，白马寺庙也遍布于越南各地。历史上的白马大王就是东汉伏波将军马援，白马信仰就是伏波信仰。西汉武帝灭南

越南,并在越南中部、北部设置交趾、九真、日南三郡,其后长达一千多年,今越南中北部一直由中国各朝代设州郡直接管理,越南历史上也将这一时期称为“北属时期”或“郡县时代”。东汉时,交趾郡女子二征举兵造反,光武帝刘秀任命马援为伏波将军平叛。马援平定二征之乱后,修建城郭,穿渠灌溉,整饬法规。这一地区进一步受到中原先进文化的影响。^[12]然而时至今日,越南河内白马庙里已无任何伏波信仰和崇拜的痕迹,取而代之的是一匹白马,传统文化的伏波信仰开始被解释为龙肚信仰。^[13]

4 古籍整理需要理论思考

传统意义上,古籍整理被视为小学,其实“小学”二字最早不专指学校。两汉时一般以文字学为小学。近人章太炎说:“盖小学者,国故之本,王教之端,上以推校先典,下以宜民便俗,岂专引笔画篆、缴绕文字而已。苟失其原,巧伪斯甚。”宋代以后,小学作为大学对应称谓,遂被看作以文字学为内容的基础学问。清人黄以周在《说文解字补说叙》中说:“故欲谭道者先通经,欲通经者先识字。”^[14]虽然作为小学的古籍整理,直面的都是具体且琐碎的工作,似乎只要墨守陈规即可,但是,要想推陈出新,同样需要理论思考。

多年以来,我们一直从事古籍的编纂与整理。《今注本二十四史》与《域外汉籍珍本文库》,都是写入国务院颁布的《国家文化发展纲要》中的重大文化工程项目。在具体的工作中,我们感悟到,古籍整理不是简单的版本校正、勘误标点、注释索隐等等,不应该把史料整理与研究分开,而应该由小见大、以微知著,进行深入的理论思考。

《域外汉籍珍本文库》的编纂,肇始于2003年,收尾于2018年,延宕15个春秋。这部大型丛书收集了国内所未见的汉籍珍本3000余种,编纂成书800本,分5辑依次刊印。本书所收集的文献内容丰富,知希则贵,是研究古代文化的基础资料,也是讨论古代中外文化关系的核心资料。在此书的编纂过程中,我们所做的一些思考,得到了学界的好评,并逐渐成为学界的共识。

关于“汉籍”的概念,我们有不同于传统的定义,即不能简单地从民族、国家的视角来理解,而应该从文化的视角来解释。汉籍不能简单地看作是汉民族的书籍或中国的书籍,而应该理解为汉字写就的作品,至于作者的民族与国籍,不应该作为定义的条件。我们编纂的《域外汉籍珍本文库》在编纂凡例中,对“域外汉籍”的属性做出清晰的厘定,即本丛书所收古籍以域外各机构或个人收藏之汉籍善本、孤本、稀见本为主,大致包含三类:一,中国历史上流失到域外的汉文古籍;二,古代域外各国翻刻、整理、注释的汉文古籍;三,古代域外学人用汉文撰写的、与中华文化有关的重要著述。^[15]对汉籍概念定义之订正,可以拓宽域外汉籍的研究视野,同时也给零落在域外的汉籍找到可以归属的家园。

在《域外汉籍珍本文库》的编纂中,我们还提出了“汉籍之路”的概念。19世纪末,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提出“丝绸之路”,嗣后,这个概念遂成为打开中外交流史大门的钥匙。这些年来,我们通过编纂与研究域外汉籍的学术实践,渐渐地感到这把钥匙问题很多,局限性很大,很多中外交流史研究的大门,其实用它难以打开。中外经济交流与文化交流的道路并不完全重合,如果我们用“汉籍之路”来概括古代中外文化交流,也许更为妥帖。以东亚古代汉籍传播与交流

案例来考察,可以十分清晰地看出古代中外文化交流的源与流的关系,有时候源成为流,有时候流又化作源。汉字是古代东亚最基础的文字,古代东亚学人留下大量笔谈,这不是因为他们喜爱笔谈,而是在语音不通时,用文字表述自己见解,则更方便。古代的汉籍不仅承载了中国的文化记忆,也承载了东亚各民族的文化记忆,是东亚各国文化交流的见证。毋庸讳言,“丝绸之路”无法描述古代东亚的文化交流。丝绸之路是一条商贸的道路,汉籍之路则是一条文化的道路。区别这两条不同的道路,对于澄清某些不必要的误会,拓宽研究的视野,肯定会有更深远的意义。^[16]

5 古籍整理需要方法创新

古籍的代代传承就是古籍整理方法创新的历史。古籍的文本从竹简、木牍、帛书到不同形制的纸本等等;古籍的篇目从独立的卷、册到会要、类编、丛书等等;古籍的释义从删、编到传、训、诂、音、注、疏、笺等等;所有这些,都是古籍整理方法的承继与演进。可以说,没有方法的创新,就没有古籍整理这门学问。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各个高校院系调整,基本把古籍整理作为文献学,归入中文系,这其中有些问题。在古代,文史不分家,若完全遵循现代中文学科圭臬去做古籍整理,或多或少会有一些偏颇。

《今注本二十四史》覃思卅年、精心结撰,卷帙浩繁,规模庞大,全书24种约1.4亿字,现在已有18种出版。这个文化工程是一项有重大意义的学术项目,是对中国正史全面系统的整理,体大思重。项目集聚了全国各科研机构与高校的300多名史学家,戮力同心,共襄义举。项目从始至今已近30年,21位主编和顾问已经去世。在《今注本二十四史》编纂过程中,我们博采众议,携手倡导“史家注史”的注释理念,努力打造今注本史籍独特的学术标识。这些年来,在我国为古籍做注释的多是文献工作者,然而,在编纂《今注本二十四史》伊始,我们便考虑延请历史工作者。与文献工作者偏重字词音义不同,历史工作者则更关注史实的舛误与文义疏通、史料

的收罗与文本的诠释。

关于史实舛误的订正。《史记·夏本纪》关于太康失国的记载仅有五字“帝太康失国”,旧注也未见发明。其实太康失国让夏王朝的统治断续40多年,是一个颇为重要的历史事件。今注本《史记》则援引《逸周书》《国语》《离骚》《韩非子》等诸多史籍文本,讨论这个事件前因后果,为今后的研究提供了丰厚的学案索引资料。^[17]《汉书·文帝纪》记载汉文帝曾下诏书,要求每个地方给80岁以上的老人,每人每月米一石(一石约等于今60千克)、肉二十斤(一斤约等于250克)、酒五斗(一斗约等于500克)。今注学者认为,在两千年前的汉朝不可能实行这样的高福利养老措施,注者通过理校的方法,发现“月”字是文本衍误,汉文帝的赏赐应该是一次性的举措。^[18]一个字的正误,可以改变对中国古代养老与养老文化的记述与评价。

关于文义疏通的注释。我们读古籍,经常会遇到字词无碍、但意义无法通达的情况,史家注史就是将古籍文本中滞塞之处予以化解,为读者提供一个比较确信准确的注释。如《金史·世纪》记载“金之始祖讳函普,初从高丽来”,这里的记载非常容易引发对女真族属的误会。今注学者对此条注释如下:“《三朝北盟会编》卷三:‘本高丽朱蒙之遗种,或以为黑水靺鞨之种,而

渤海之别族。’《松漠纪闻》：‘女真酋长乃新罗人，号完颜氏。’按，女真本黑水靺鞨之后，所谓高丽之遗种或新罗人，皆误以其曾附高丽而为其族属”。^[19]今注用史料疏通文义，“给予《金史》记载以明晰的注释，不致使读史者误读”。^[20]

关于文本史料的增益。广泛收罗来源可靠的文献，以注释的方式，对注释的文本做文献的补充，是史家注史的一项重要任务。裴松之为陈寿《三国志》做注释时，把注文概括为补阙、备异、惩妄、论辩四类。前两类主要补充增益陈寿漏记之事，或与正文之不同说法。裴注补充的文献，已与正文合为一体，成为《三国志》的基本文本。今注本《汉书·东方朔传》则在经史、类书等文献中爬梳剔抉，搜寻佚失的《东方朔传》的材料，增补到注文中。^[21]在《今注本二十四史》印行的文本中，这样的注释不胜枚举。

关于文本的诠释，或可以从图像证史来谈。图像证史是《今注本二十四史》注释的一个特征，也是史家注史的一种特殊方法。用文物造像、图像为史料可以对文本证实、证伪，还可以用图像的形式描述一些复杂的、文字难以表述的内容。今注本《后汉书·舆服志》根据考古出土的画像、造像、实物，与文献记述比照，绘制了大量图像，以图释文。^[22]以图释文，立象尽意，应该是史家注史方法的创新。

6 数字化是未来古籍整理的必由之路

如上所述，古籍的文本有一个从简牍、帛书到纸本的演进过程。到今天，从纸本到文本的数字化恰恰又是古籍文本的未来形态。古籍数字化是指利用数字信息技术对古代文献进行重新整理加工，将其纸质文本转化为电子数据，再通过电子数据予以保存、传播。古籍数字化是一场深刻的变革，通过电子数据的加工和展现，可以达到对古籍再生性保护，也方便古籍各种形态之间的转化。

古籍数字化属于古籍整理的范畴，是古籍整理今后的发展方向。2013年，我们在编纂《域外汉籍珍本文库》项目的基础上，提出了“域外汉籍电子文库”项目，并被列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创新工程项目。

“域外汉籍电子文库”项目，是把珍藏于国外各图书机构的古代汉籍文献，通过照相、扫描、复印手段进行复制，然后电子数据化，建成一个庞大的方便检索的文献数据平台。项目计划十年，完成后将拥有约10万条书目信息，5万本汉文古籍，其中有许多是国内不见或稀见的汉文珍本。

“域外汉籍电子文库”是一个很有意义的项目。其一，它的完成，将初步囊括世界各地图书馆、博物馆及其它机构收藏的汉文古籍，为学者提供宏富的学案资料。新的文献文本发现，将引发新的学术思潮。其二，由于这个项目规模较大，收罗较为完备，且检阅方便，使用率高，这无疑可以彰显中国社会科学院在国际汉学界的学术影响力。其三，国外收藏机构对汉籍的整理与保护，手段多不规范，损毁时见，把一些珍本复制回归，也是另一种保护汉文遗存的形式。其四，本项目将把许多外国人、尤其历史上使用汉字的周边国家学人用汉字写就的典籍，一并收入，毫无疑问，这可以强化东亚地区的文化认同。

“域外汉籍电子文库”电子平台现已搭建完毕，已经完成了70 000余种书目的收集与导入，5 000余种书目提要的撰写与导入，5 000种以上图像文本的编纂与导入，做到可以网上检索查阅。

“域外汉籍电子文库”是一个非常具有特色的古籍电子数据库，以收集域外汉籍为内容，资料宏富。若假以时日，“域外汉籍电子文库”将有望与“中国基本古籍数据库”并立，成为汉籍文献存藏、阅读、检索的两大基本数据库，为世界各国人文科学研究提供最基本的学案资料。从本文库已经收录的文献来看，很多古籍都是国内不见或稀见的，这将为学术研究提供更新鲜的学术资料，引发新的学术热点。更重要的是，诸如舆图等难以收寻的史料，可能成为彰明我国疆域历史性权利的重要证据，关系到国家领土完整，我们更应该从政治的角度，认识域外汉籍电子文库建设的意义所在。这个电子文库平台结构合理，逻辑清晰；页面规整，古色古香；分类完备，完全符合古籍编目规范；检索分模糊与高级两种，十分方便。

“域外汉籍电子文库”是当前古籍数据库的一个特色鲜明创新平台，若能继续完备，丰富其内容，必将有其重大的国际影响力。在这个文库构建与打造过程中，我们真切地感受到古籍数字化的魅力与意义。我们要系统梳理传统文化资源，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23]

这些年来，历史研究有碎片化的趋势，古籍整理，也缺乏必要的理论考量与方法创新。其实，古籍整理工作不是锯盆、锯碗、锯大缸，不能仅仅做补阙挂漏、刊谬补缺工作，还要有理论探索的自信与方法创新的锐气。独立千载谁与友，自成一家始咏成。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强调 坚持党的领导传承红色基因扎根中国大地 走出一条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新路 [EB/OL]. (2012-4-25) [2022-8-17]. http://www.news.cn/politics/2022-04/25/c_1128595417.htm.
- [2] 新华社.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 [EB/OL]. (2022-4-11) [2022-8-18]. http://www.gov.cn/zhengce/2022-04/11/content_5684555.htm.
- [3] 杨伯峻. 孟子译注 [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5: 233.
- [4] [清] 阮元. 十三经注疏·论语注疏: 第9卷 [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9: 5409-5410.
- [5] 吴树平. 今注本二十四史·史记: 第47卷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20: 4323.
- [6] [清] 阮元. 十三经注疏·论语注疏: 第7卷 [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9: 5390.
- [7] 陈智超. 纪雪娟. 今注本二十四史·旧五代史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21: 4-6.
- [8] 中共中央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 [EB/OL]. (1981-9-17) [2022-8-18]. <https://www.neac.gov.cn/seac/mzwh/201012/1076806.shtml>.
- [9] [清] 阮元. 十三经注疏·尚书正义: 第12卷 [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9: 398.
- [10] [元] 脱脱等. 宋史·文天祥传: 第418卷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5: 12540.
- [11] [日] 庆应艺塾大学研究小组. 在旧书店所发现的最古老中国《论语》写本. [N]. 朝日新闻 (あさひしんぶん), 2020-9-26 (19).
- [12] 卜宪群. 周天游. 今注本二十四史·后汉书: 第24卷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21: 1874.
- [13] 王柏中. “伏波将军”抑或“龙肚之精”——“白马大王”神性问题辨析 [J]. 世界宗教研究, 2011 (4): 152-157.
- [14] [清] 黄以周. 黄式三黄以周合集·说文解字补说叙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4: 540.
- [15] 域外汉籍珍本文库编纂出版委员会. 域外汉籍珍本文库·编纂凡例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8: 1.
- [16] 孙晓. 古代东亚的汉文献流传与汉籍之路的形成 [J]. 社会科学战线, 2017 (11): 9.

- [17] 吴树平. 今注本二十四史·史记: 第2卷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20: 210.
[18] 孙晓. 今注本二十四史·汉书: 第4卷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20: 261-263.
[19] 张博泉. 程妮娜. 今注本二十四史·金史: 第1卷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20: 4-5.
[20] 宋德金. 宋卿. 史家注史 泽被后世——《今注本二十四史·金史》评介 [J]. 中国史研究动态. 2021 (6): 49.
[21] 孙晓. 今注本二十四史·汉书: 第65卷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20: 5329.
[22] 卜宪群. 周天游. 今注本二十四史·后汉书: 志第29、30卷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21: 6813.
[23] 习近平在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 [N]. 人民日报, 2019-1-27 (1).

Investigating the Past, Revitalizing the Present, and Spreading the Culture: Thoughts on Promoting the Collation and Research of Ancient Books in the New Era

Wang Xie^{1,2} Sun Xiao^{2,3}

- (1. School of Continuing Education and Distance Education,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Economics, Beijing 100029, China;
2. China Sinology research and Exchange Center,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102, China;
3. Institute of Ancient Histor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102, China)

Abstract: [**Purpose/significance**] Ancient books are the bridges connecting history and reality. The ancient books collation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in continuation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Opinions on Promoting the Work of Ancient Books in the New Era can direct us to promote the collation and research of ancient books in the new historical period. [**Method/process**] Based on experience of many years of work, the connotation and value of ancient books,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trends of knowledge are discussed and analyzed. [**Result/conclusion**] This paper proposes that there should be theoretical thinking and method innovation in the collation of ancient books in the new era.

Keywords: Ancient books; Culture security; The road of Chinese books; Historians annotate historical books; Digitization of ancient books

(本文责编: 孔青青)